

集结文化实力

凸显中国话语

学问 中国

哲学 赵汀阳
政治 刘军宁
经济 盛洪
社会 汪丁丁
法律 苏力
教育 杨东平
历史 秦晖
生态 吴国盛

江西教育出版社

哲学：赵汀阳

政治：刘军宁

经济：盛 洪

社会：汪丁丁

法律：苏 力

教育：杨东平

历史：秦 晖

生态：吴国盛

学问中国

书 名:学问中国
作 者:赵汀阳、刘军宁、盛 洪、汪丁丁
苏 力、杨东平、秦 晖、吴国盛
出版发行:江西教育出版社(南昌市老贡院8号)
经 销:各地新华书店
印 刷:江西科佳图书印装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850×1168mm 1/32
印 张:11.5
印 数:10251—15250
版 次:1998年4月第1版
1998年5月第2版第2次印刷
定 价:20.00元
书 号:ISBN7-5392-3045-2/Z·30

邮政编码:330003

(赣教版图书凡属印刷、装订错误请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D1-H85/29

前言

前言

我们特别邀请了8位有代表性的著名青年学者分别从各自思想领域表达了他们在建设新一代中国的思想学术时所思考的部分重要问题和各自富有创造性的观点。我们相信这些观点将使人感觉耳目一新,并且将促进中国思想界的独立思考。

这些学者所研究的领域不同,思路 and 思想风格也不同,但他们都试图建设一种有着明显的现代中国特色的新思想,而且是面对着中国现实和未来发展问题的思想。他们的思想所表达的现实感和原创性在某种意义上预示着中国现代化的独立思想的方向和道路。

这些学者的努力对于发展充分成熟的中国现代化思想来说也许仍然是探索性的,但达到这一点显然已经非常不易。众所周知,近代以来的中国思想虽然可以说进入了一个比较活跃的时期,但一直是处于“西学”重压下的思考,基本上是屈服于西方观念的思考,或者是对西方思想的盲目无力的逆反思考,即使说多少有些创造性思想的话,也是非常

有限而且是局部问题上的创见,尤其是往往缺乏现实感,远远谈不上有比较完整的、现代化的原创性。

本书的作者们所表达的观念不仅有着明显的原创性,而且具有与西方思想家的观念同等的思想现代化水平,这多少意味着中国思想界正在由现代化的“西方话语”走向现代化的“中国话语”。

所以,我们相信这本书对于中国文化的发展是有着不可忽视的意义的。

目
录

一	智慧复兴的中国机会 \ 赵汀阳	1
	一、我们在等什么	(3)
	二、从知识眼光到创作眼光	(19)
	三、结语	(47)
二	市场经济与有限政府 \ 刘军宁	49
	一、财产权与经济自由	(52)
	二、公隐私开与私隐公开	(58)
	三、实物名分与权利自由	(65)
	四、聪明的人与聪明的制度	(69)
	五、无限政府与治乱循环	(73)
	六、限政的理由与限政的方式	(78)
	七、选拔社会到选举社会	(90)
三	经济学在中国发展 的一条线索 \ 盛 洪	94
	一、经济学是什么?	(95)
	二、作为科学和超越科学的经济学	(98)
	三、中国与经济学	(101)
	四、中国的过渡经济与中国的 过渡经济理论	(105)

五、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研究的理论背景	(107)
六、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的理论框架	(111)
七、中国的过渡经济学对中国的市场化道路的解释	(115)
八、中国的过渡经济学理论的形成	(122)
九、争论与批评	(126)
十、会有一个经济学的中国学派吗?	(131)

四 涉及市场交换行为的三种道

德立场 \ 汪丁丁 144

一、解题	(145)
二、“均衡”的涵义	(152)
三、“交换”的涵义	(162)
四、演进道德	(165)
五、结语	(168)

五 现代化进程中的

中国法治 \ 苏 力 174

一、现代法治解决的是什么问题	(177)
二、20 世纪中国的现代化和法治	(189)
三、中国法治的前景	(207)

六 中国进入教育世纪 \ 杨东平 219

一、中国教育发展的现状	(220)
二、教育的边缘化状态	(229)
三、传统教育的复活与强化	(233)
四、教育的非人文化倾向	(241)
五、大学精神的式微	(248)

六、走向教育现代化 (253)

七 文化决定论的贫困

——超越文化形态史观 \ 秦 晖 262

一、何为“文化决定论” (264)

二、实证的史学概念,还是先验的哲学范畴? (271)

三、从经验的观点看—— (276)

四、“进化非真”,还是“进化非善”?

——后现代主义与文化决定论 (287)

五、“客家”心态与“土著”的困惑 (296)

六、关于“古今一脉”的传统:“传统”

塑造了我们,还是我们

塑造了“传统”? (306)

七、关于“人无我有”的传统:“文化

不可比优劣”还是“不可比优劣

的是文化”? (313)

八、非决定论的人类史:自己对自己

负责 (321)

八 绿色中国 路在何方 \ 吴国盛 332

一、工业化道路以及“可持续发展”

作为它的修正 (335)

二、传统中国及其生态界限 (342)

三、中国现行的“可持续发展”道路 (350)

四、敢问路在何方 (358)

1 中国机会 智慧复兴的



赵汀阳 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
研究所副研究员。有
著作《美学和未来美学》、《走出哲学危
机》、《论可能生活》、《思想之剑》等。

一 我们在等什么	二 创作眼光 从知识眼光到	三 结语
-------------	---------------------	---------

尽管这个世界现在似乎使我们感到特别不满,但既定的历史是不能改变的,就像不能悔棋一样。人们往往抱怨过去伟大的智慧被丢掉了(这一点多少是夸大其词的,因为那些真正有用的智慧一直都在使用,被抛弃的恐怕是已经没有用的观念),却不去思考需要增加什么新的智慧。我们遇到了许多新问题,所以需要新智慧。显然,过去的“精神家园”是由于敌不过现代生活方式和需要才丧失的,当然也就不可能靠那些已经被打倒的东西来拯救什么。恰恰是从海德格尔式或现代儒家之类的过于深沉的呼声里,我们可以看到智慧和哲学已经多么软弱贫乏和陈旧。

智慧不再是活生生的了。过去的哲学和智慧属于过去的生活,对于现在的生活来说,它即使是“家园”,那也是不够我们住的,即使是“财富”,那也是不够我们花的。当然也有一些有着“解构”精神的批评家,他们很清楚传统哲学没劲了,他们要求对各种事情进行重新解释、理解和批判,这一点本身没有错,但其中有一种华而不实的气氛。解构和后现代给予我们的可以说是“无智慧的自由”,而不是自由的智慧。思想虽然好像自由了,可是智慧也没有了。事情很显然,解构和创造必须是不分先后的同一个过程,假如没有比较充分的创造性眼

光,批判的眼光就是靠不住的,如果没有开出一条新的道路,光把原来的道路给破坏了,那我们往哪里走呢?只不过停留在一条被破坏的道路上,而且还是那么一条老路。问题不在我们不做什么,而在于我们做什么。我们虽然知道总需要些什么新的东西,却不知道到底什么是我们确实需要的。

这是一个缺乏智慧的年代。

没有智慧是危险的,而没有新的智慧就等于没有智慧。很显然,人类生活的发展比思想方面的发展快得多,到今天,思想已经跟不上社会 and 生活方式的发展,已经对付不了技术和知识所提出的或造成的问题。我们像得了强迫症一样说出各种对行动没有意义的言论。当思想和行动不再有关,思想就成了仅仅由(by)话语产生的话语、关于(of)话语的话语和为了(for)话语的话语。这样的话语是没有智慧的。

一、我们在等什么?

1. 奇怪的问题和无话可说

我们首先关心的是中国的思想状况。

这个世纪中国一直不得不在处理一个有些特别的哲学问题,即中西文化关系问题。这个问题无疑是“特别的”,它本来不应该是哲学问题而应该只是一个文化交往的事情,但事实上这个问题长期以来被搞得越来越复杂,已经深深触及文化思想的灵魂,这样就很像是个哲学问题了。当然这个问题毕竟是个假装的哲学问题(类似的假装的哲学问题比比皆是),但为了不被这些假装的问题所误导,确实需要对这种问题进行分析。

由于众所周知的历史原因,西方文化已经成为我们不可

能回避的文化环境。许多人以为中西文化之间的事情是不同话语的对话,这种基本感觉就是错误的。西方文化涌进中国后已经在许多方面甚至在基本思维方式上改变了我们的感觉和思想。我们不仅在思考现实问题时甚至在理解解释中国自己的传统时也往往使用西方格式和思路。现在我们说起中国文化的特点时往往就好像是西方人在说中国文化的特点,虽然是我们在说话,但其实是西方话语(通过我们的嘴)在说话。很显然,我们用来描述中国文化的格式和框架以及所作出的价值判断很大程度上是西化的。现在的问题不是要中要西,而是我们是否知道我们的文化的真相是什么样的——当我们的文化已经按照西方文化的理解方式被“改写”了一遍?进一步说,我们是否还有着一种纯粹的中国文化,哪怕是纯粹的某个部分?当然,我们的生活习惯或者说民俗应该说还是很中国的,不过民俗并不决定一种文化的实力,民俗是我们在思考现实困难时必须重视的,但它毕竟不是文化的先进部分。

西化的“改写”是处处可见的,例如中国哲学也被划分为存在论、知识论、政治社会哲学之类;社会历史被描述为什么奴隶社会、封建社会或者东方专制社会之类,等等,还有,把儒家思想也当成了“教”(其实连佛教都很不合乎西方的宗教概念),事实上儒家思想只不过是一种曾经代表着国家的政治—伦理精神的主流意识形态,就像西方的民主观念是一种主流意识形态一样。假如像儒家思想这么入世的观念都算是宗教,那随便什么观念都可以算是宗教性的了。诸如此类。结果搞得我们不知道我们到底有什么和缺什么、什么好什么坏。反正有什么没什么,什么是好的什么是坏的,都是按照西方话语来说的。

我们自己无话可说。

现在我们很想说中国话语,但是,光有愿望是不够的,必

须创造出有分量有水平的思想。精神领域和物质领域有一点是一样的：一种产品必须有实力才真正有话说，话才能说得下去。就是说，一种文化不能仅仅是一种“声音”（不管说“是”还是说“不”），拥有一种独立的、先进的文化决不等于某种不同于西方的、好像是“我们的”声音，一种声音必须具有文化实力才能成为一种对现实有着塑造力的话语。什么是一种文化的独立性？决不是一种自我保护的态度加上某些历史原因造成的特点（一种传统总会有一些特点）。文化独立性首先意味着别人无法忽视的实力和潜力，意味着领先或者平行的发达程度，或者干脆说：

领先就是特点，领先就是独立。

当然，文化的许多方面是难以绝对地判断是否是“领先的”（文化是“软”的），但一种文化或它的某个方面是否是有实力的，事实上管不管用，是强有力的还是弱勢的，等等这些还是能够感觉得出来的。假如收敛一些来说，也应该说，如果一种文化的特点是足够有意义的，那么这种特点必须能够使这种文化成为足够强大的文化或者不弱于其他文化的文化。如果不能领先，不够先进，就算有些特色，又有什么用？这就像，有个人很有个性，但没有能力，那这个人有什么用？同样，要说出站得住的中国话语，就必须创造出新的有实力的思想，而不是靠复兴一些已经过时了的、好像很有特点的旧思想，例如儒家观念体系或者东方神秘主义观念。这些观念在过去就没有能够使我们的文化发展成先进的文化，怎么能够指望它们在今天如此复杂的情况下承担起有着更多需要的现代文化和社会呢？

现代社会有着各种新的要求和新的情况，除了发展出新的智慧，不可能有什么别的办法。当然，这不是说传统是坏的，而是说传统是不够的。毫无疑问，传统里有许多好的东西

(比如决不至于像谭嗣同认为的,除了“朋友”一伦,其他各种伦都是坏的),关键是怎样利用。当仅仅问到一个东西“好不好”,这是个坏问题,其实我们真正想问的是一个东西“好在哪里”和“放在哪里是好的”。

在我看来,“要中还是要西”是个糊涂问题,或者说根本就不成问题,是这样的:通常“中”和“西”指的是中国的文化传统和西方的文化传统,那么可以说,这两者都不够用,都不足以承担和解决如此多的新问题,都只有参考价值。而且,正如上面说过的,事实上是中国文化在很大程度上被西化了,西方文化成了主要的解释原则(解释了什么是先进的和落后的、什么是现代的和后现代的、什么是人道的和不人道的等等)。现实是最大的话语,现实在事实上已经消解了那些书面上的“中西”问题。

真正的问题其实不是“中西文化”的问题,我宁愿认为是我们单方面的问题,即,我们如何能够在将来建立起一种先进的有实力的中国文化。就是说,要讨论的主要是应该去创造什么、如何去创造的问题,而不是在现成的东西里进行选择——我们的思想有时候太容易受现成的东西所约束,就好像我们只会继承遗产、不再有创造力了一样。

或者说,当思考到我们的文化的根本选择时,这其中并不包含“中还是西”的问题,很显然,我们将来的文化,我们所需要发展出来的文化,肯定既不很像传统中国文化又不很像西方文化,至于将是什么样,只能在一步一步的创造中一点一点明朗起来,我们不可能知道而只能去创造。所谓“中西”问题只能减弱为非常具体的局部问题。

对于我们来说最有利的思考方式是:把一切文化资源平等化。

按照“什么能够成为我们的”(而不是“什么是我们的”)思

路,按照“什么最有利于我们的存在”(而不是“什么是我们最习惯的”)的要求去重新利用任何一种文化资源,才能建立一种新的文化。某种文化思想最开始属于谁,这并不特别重要,假如我们的油画水平最高,或者逻辑水平最领先(油画和逻辑学算是西方的),那么这两种文化就会变成我们的;同样,假如我们的中医别人搞得比我们更好,那就变成别人的。

要重新创造出一种有实力的中国文化,首先需要争取到能够独立进行文化创造的各种机会,当然这主要是个政治、经济方面的问题,不过,政治和经济恰恰是文化中的最有实际影响的部分。最大规模、最有影响的文化并不是那些书面上的、由文人趣味所认同的狭义的“文化”。中国许多学者在思考中国文化时很容易受到文人趣味和特定学科的“专业性”的限制,眼光往往不够深远,而且缺乏现实感,可以说既没有想象力又不够“精明”,相比之下,政治家们的眼光更值得重视,例如毛泽东和邓小平。毛泽东的一些想法可能是过激的或者偏激的,但他非常正确地意识到要有与新的生活方式相匹配的新思想文化,而且意识到传统的优秀遗产或者是西方的思想只有当我们自己有了足够有力的新思想才有可能接纳它们。就是说,旧的观念或外来观念只有在我们有能力重新解释它们时才能被利用,而构成解释能力的基本思想必须是按照现实需要被我们自己创造出来的。毛泽东的“第三世界”理论无疑是非常有想象力的,它给当时的中国话语提供了独特的文化定位。邓小平在允许开放的同时始终处处强调去探索发展出中国特色,这意味着什么是现实所需要的“中国特色”正是尚未很明确和定型的,正是需要讨论探索的,邓小平强调的就是去试验,这可以理解为是给中国文化的创新留出余地和自由空间,而不是仅仅依靠一些旧的文化资源。

总之,把希望寄托在尚未定型的创新上比寄托在“失落了

的”家园上更有前途。既然我们的文化现在事实上已经很西化了,那么,一种真正的“中国文化”只能是将来时的,只能在事实的余地里去创造。如果说我们能够走出一条新的道路,即使这条道路和我们的传统不太相似(完全不相似也是不可能的),但既然这条路是我们创造出来的,那么它就是我们的;或者,即使我们走的路与别人走的路更为相似甚至一样,但是我们走得更好或走在前面,那么,这条路也变成我们的。要比较的不是传统,而是创造和发展。

2. 传下来的统和可传之统

即使我们认清了真正的问题是一个文化创新的问题,我们仍然会特别关心传统。传统无疑是用起来比较方便、比较容易发挥其优点的资源。但什么是传统?这一点却有些模糊。通常的感觉是,传统是前人传下来的“东西”。这“东西”很需要分析。它其中有一部分其实就是我们的现实的一个构成部分,它“化”成了我们的现实,这一部分传统是活生生的,虽然是在过去创造出来的,但却不是过去了的东西;另一部分是事实上已经过去了的东西,它是没有化成现实的过去的观念,但它也“传”下来了,作为“文献”或者类似的东西。前者是“活物”,是“遗产”,是真正传下来的统,后者是“死东西”,是“遗迹”,虽然似乎不能说是失传的统,那也应该说是不起作用的传统。可见,应该重视的传统应该是前者,是传下来了统,它其实就是现实。

如果搞清楚这一点,许多问题就能自然而然地解决。比如说,有些思想观念已经死了——所以死了当然是由于与现实或历史发展不合——即使那些死了的观念好像很迷人,我们都不能太把它们当真。想复活一些与现实和未来格格不入的观念是不可能的。那些作为遗迹的“传统”可以是纪念性

的,我们怀念它们,对它们进行有趣的描述,或者可以是历史学的对象,可以是现实思想的一种参考,但决不可能成为关于现实和未来的规划,甚至也不是现实思想的主要参考。为了更清楚地讨论问题,不妨把那种死传统就称作“遗迹”,这样能够更好地理解什么是与我们息息相关的传统。当我们意识到传统就是真的传下来了的活生生的东西,就可以看出:传统即现实。

我们想要并且需要改造传统就是理所当然的了,因为我们想要并且需要改造现实。显然,我们万万不敢说现实或传统已经使我们非常满意。哲学和人文学者时常会认为现在已经成为遗迹的传统是更好的,它们包含着更伟大的价值。这样想也许不是一个知识论上的错误(因为不可能有关于未来的知识,所以甚至不是一个知识论问题),但却是一个存在论上的错误。想象的自由度比创造的自由度大得多,如果我们真的是在思考事实的问题而不是在幻想,就会知道真正的思想创造是一种虽然大胆但更收敛的智慧,就是懂得如何利用事实所允许的自由。而无论是野花花的狂想还是固执的保守都是在滥用自由,都是对存在要求的漠视——别以为固执的保守是稳重,保守是盲目的,所以是滥用自由。也许那些遗迹或家园是最好的(权且这么说,其实这种判断是混乱的),可是事情变了,世界变了。

由于传统即现实,因此又不得不利用传统。利用传统是非常复杂的问题,在这里我只想讨论其中具有原则性的一点。无论要利用什么样的文化资源,传统的还是外来的,这个学派的还是那个学派的,如果各种各样的文化资源能够协调地结合起来发挥作用,显然需要有一种一致的解释形式或框架,使得各种东西能够在一起获得共同的生命。这就像器官的移植,必须在机体能够接受它时才有意义。这种解释形式或框